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谭旭运 吕 邈

摘要: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的流动体验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具体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研究可为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关键词:青年 社会流动感知 获得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增强,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取得巨大进展。与此同时,社会心态也发生变化。民众对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关,但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系(王俊秀,2018)。对社会阶层变化和流动的感知(下文主要表述为“社会流动感知”)是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青年的社会流动感知与其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直接且紧密的关联(Huang et al.,2017),进而进一步影响青年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和信心。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①,其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和社会生活质量提升新标尺的“获得感”,同样受客观社会阶层和流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流动感知的影响(谭旭运等,2020)。

与客观社会阶层流动相比,民众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社会态度、社会评价和行为表现等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陈晓蓉等,2022)。但客观阶层流动的情况较为复杂^②,而且人们对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比如,对当前经历的体验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有所不同;如果不区分“社会流动感知”的具体内涵,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Day & Fiske,2017;Kraus & Tan,2015;吴炜,2016;张跃等,2019)。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分析青年社会流动感知^③和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以期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流动、有效提升获得感提供相应参考建议。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21JZD038)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22DSHJ02)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本文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4月1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2月20日。

② 比如,社会整体的流动状况可能同个体自身的流动经历不一致,个体自身的代内流动经历和子女的代际流动经历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③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感知”:流动信念(主要针对社会整体)、流动体验(主要针对个体自身)、流动预期(主要针对子女)。下文具体说明。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 社会流动与社会流动感知

社会流动也称“阶层流动”,是指一定社会分层体系中民众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的变化的过程(陆学艺,2006)。按照不同标准,可以把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社会地位基本不变)和“垂直流动”(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代内流动”(自身职业或阶层地位发生变化)和“代际流动”(同一家庭几代人职业或阶层地位发生变化),等等。

社会流动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陈云松等,2019),常被看作社会开放和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它强调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并改变自身处境(Day & Fiske,2017)。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陆学艺,2006),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和合理程度都有很大提升。

“社会流动感知”是民众对社会整体和自身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判断(Kraus & Keltner, 2013)。社会流动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相信社会系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渗透性,允许不同阶层的自主流动(Taylor & Moghaddam,1994);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公平合理(Day & Fiske,2017)。与客观社会流动相比,社会流动感知与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幸福感等具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Huang et al.,2017);更能反映个体决策时的参照信息,能涉及客观社会流动无法涵盖的细微却实质性变化,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盛智明,2013)。

社会流动感知基于社会整体环境和个人自身处境而形成。但是,在聚焦社会整体环境还是个人自身处境、关注当下体验还是未来预期方面,不同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有研究更关注民众对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感受(Day & Fiske,2017;陈晓东、张卫东,2018);另一些研究更倾向基于个体内或代际的阶层变化状况,关注个体自身的阶层流动或对下一代阶层流动的预期(Kraus & Tan, 2015;陈云松、范晓光,2016;吴炜,2016)。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紧密相关又存在明显差异,其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行为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来说,个体对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的主观感受,常被称为“流动信念”(Day & Fiske,2017)。高水平流动信念使民众相信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和可渗透性,从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稳定(Sagioglou et al., 2018)。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流动信念的影响较大,其中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尤为重要;流动信念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还取决于民众对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的知晓程度(陈晓东、张卫东,2018)。

流动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当前社会阶层与过去或上一代相比的阶层流动结果的认识(陈云松、范晓光,2016)。流动体验与个体自身社会阶层认同具有较强关联,个体向上流动体验的“效应尺度”显著高于教育、职业、声望等客观指标(陈云松、范晓光,2016)。

流动预期是个体对子女社会阶层相比于当前自身阶层未来变化的预期(吴炜,2016)。流动预期较高的个体认为,子女能拥有平等享有更好教育、赚取更多收入以及获得想从事的任何工作的机会(Kraus & Tan, 2015)。研究发现,青年流动预期呈现向上流动趋势,总体上从中等偏下的主观社会阶层转至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主观社会阶层(吴炜,2016)。

当代青年在市场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成长,他们的社会流动感知是转型期民众面对社会与时代变迁时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陈晓蓉等,2022)。青年对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直接影响身心健康和社会态度,进而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研究发现,代内流动的减弱以及代际流动继承的增强,使青年群体内部由于文化、经济、社会等资源占有有多寡的不同,形成了非正常的社会流动现象。尽管如此,对当前中国青年社会流动是否已存在“阶层固化”的认识仍存在争议。有研究发现,客观社会阶层结构的向上变化带来主观阶层地位的不断提升,对青年的社会流动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大多数青年对流动预期持乐观态度,“向上流动”是中国青年流动预期的主流;与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青年相比,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青年流动预期更加乐观(吴炜,2016)。

(二)“获得感”的概念内涵及相关研究

“获得感”不仅是个体对自身获得状况的主观感知,还体现了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发展目标的群体认同。“获得感”是民众对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多寡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是主观感受与客观获得、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多维度主观指标(文宏、刘志鹏,2018);是民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应(谭旭运等,2020)。“获得感”的建构不只在个体生活体验的简单描述,还要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心态指标,从而更为全面、更加人性化地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质量(吕小康等,2022)。

基于对需求满足相关理论的分析,谭旭运等(2020)提出,可以从五个维度分析获得感。这五个维度分别是:获得内容(满足个体需求的获益)、获得环境(对个体获益的支持,尤其是有助于满足生活需求的政策保障和社会氛围)、获得途径(实现需求满足的途径)、获得体验(对需求满足的内在积极体验)和获得共享(在感知到社会给予的恩惠或帮助的基础上,表达出的感激之情和反应倾向)。获得感结构中任何维度的满足都能带来相似的积极体验,进而带来生活满意感和幸福感;如果其中某个维度“缺失”或没有得到满足,往往会出现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对新发展阶段下青年获得感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不同青年群体获得感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等方面。谭旭运等(2018)从获得感项目重要性、当前获得感知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探讨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及其差异特征。研究发现,重要性和未来获得预期均较高的项目主要是“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重要性较高但当前获得体验和未来获得预期均较低的项目主要是“满意的收入”“公平”“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此外,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宏观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质量、社会经济制度保障等)和微观个体因素(包括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住房状况等)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马继迁、朱玲钰,2021;聂伟、蔡培鹏,2021;谭旭运等,2020),探索提升青年获得感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

社会流动涉及个体阶层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个体收入、机会和社会声望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与损失,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如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产生很大影响。

流动信念可以提升个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Schneider,2012)。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越强,个体的“制度维护意愿”(如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越强(Day & Fiske, 2017)。流动信念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当流动信念较强时,个体更偏向未来潜能的实现、更能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幸福感(Yang & Zhao,2019);当流动信念较弱时,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再分配偏向”(Shariff et al.,2016)。通过提高流动信念,能够提升青年对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的积极态度,也表明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社会资源、提升社会阶层。

个体对自身的阶层流动体验同样对其心理体验和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以往研究发现这种影响结果并不一致。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两种“竞争性假设”(张跃等,2019)。其中,“分离性假设”认为,流动体验让个体从熟悉的“原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从而产生社会孤立感和疏离感(Manstead,2018);由于难以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容易产生沮丧、焦虑等“分离体验”(Houle,2011)。“社会适应性假设”则认为,阶层流动包括“再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摒弃“原生阶层”中习得的价值观、规范与习俗,不断适应新的“阶层环境”(Daenekindt,2017)。

不同流动体验对个体的影响不同。“向上流动体验”更可能给个体带来积极影响,他们能更积极地适应阶层地位的变化,更可能在健康、幸福感等方面获益(张跃等,2019);“向下流动体验”更可能使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挫败感,在适应过程中面临更多压力与困难,对生理或精神健康产生非常强的负面影响(Jin & Tam,2015)。从压力情境下的资源支持和应对策略看,经历“向下流动”的个体不仅要承受物质方面的压力,还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持续的低地位或向下流动体验可能导致个体更可能出现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王甫勤,2011)。

流动预期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同样重要。盛智明(2013)的研究发现,向上流动预期能显著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郑畅、孙浩(2016)分析2010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相关数据后发现,向上流动预期能显著提高民众社会公平认知。此外,向上流动预期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Posel & Casale,2011);对收入状况、未来资产以及工作条件的预期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具有向上流动预期的个体,在其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会有意识学习“目标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化其对“目标阶层”的认同、加速适应过程,从而有效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王甫勤,2011)。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预期社会阶层的上升或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都会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陈丽君等,2022)。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青年的流动信念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感知社会整体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获得感越强;

假设2:青年的流动体验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感知自己社会地位高于父辈的程度越大,获得感越强;

假设3:青年的流动预期正向预测获得感,即青年预期子女社会地位高于自己当前的程度越大,获得感越强。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20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Survey)。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完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分层抽样和PPS概率抽样,抽取604个区县的314个城镇社区和290个农村社区,对其中在现地址居住6个月及以上、年龄在18岁到70岁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195份。其中,男性占43.25%,女性占56.75%;平均年龄42岁。经筛选后共获得青年(年龄范围18—45岁)有效问卷6257份。其中,男性2664人,占42.58%,女性3593人,占57.42%;平均年龄33岁。

(二)变量测量

1. 自变量

(1)流动信念。采用“社会阶层流动性感知量表”(Sagioglou et al.,2018),测量受访者对社会整体流动状况的感知。剔除信度较低的反向题目,最后保留4个题目,分别是:“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在他的一生中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很容易发生变动”“在当今社会,‘白手起家’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当今社会,富人仍然可能失去一切而变成穷人。”请受访者对每项陈述进行7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计算4个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流动信念越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751。

(2)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采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测量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Adler et al.,2000)。呈现一个自下而上标记为1—10十个数字的十级阶梯图片,然后告知受访者:“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如图1所示,梯子从上往下看,10代表最顶层,1代表最底层。”

选用“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的上一代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题目分别测量受访者自己和父辈的主观社会阶层;自己主观社会阶层减去父辈主观社会阶层,得出受访者的“流动体验”。选用“您认为您的下一代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题目分别测量受访者子女和自己的主观社会阶层;子女主观社会阶层减去自己主观社会阶层,得出受访者的“流动预期”。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均为一列以 $[-9,9]$ 为区间的连续变量。

2. 因变量

因变量为获得感。采用“获得感量表”进行测量(董洪杰等,2019),包括5个维度共14个题目。



图1 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图片

其中,获得内容包括“我有条件去旅行”“我有一份不错的收入”2个题目;获得体验包括“现在的生活让我过得很舒适”“想到现在获得的,我感觉很圆满”等3个题目;获得环境包括“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了我很多后顾之忧”“社会的包容友善让我的生活更加美满”等3个题目;获得途径包括“我一直在为更好的生活拼搏”“我总想方设法发挥自己的才能”等3个题目;获得共享包括“全社会同甘共苦,胜过个人独占独享”“我感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等3个题目。

“获得感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将14个题目平均分作为总体获得感得分,各维度上所有题目的平均分作为各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在该维度获得感越高。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良好,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892;获得内容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0.693,获得环境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740,获得体验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795,获得途径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960,获得共享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0.721。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状况、婚姻状况和子女养育情况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等客观社会阶层变量。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基本状况

1. 流动信念、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

统计分析发现,流动信念的均值为4.84(标准差为0.97),中值为5.00;流动体验的均值为0.75(标准差为1.67),中值为1.00;流动预期的均值为1.74(标准差为1.67),中值为2.00。

与流动体验相比,青年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流动体验(均差为0.99,标准差为2.48,t值为31.45,自由度为6256,p值小于0.001)。

与父辈相比,青年流动体验普遍上升0.75;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上升1.74。

2.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人口特征差异

统计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等人口特征变量在流动信念、流动体验和流动预期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可以看出,青年社会流动感知在人口特征上具有较高一致性,说明青年对社会阶层流动状况感知的“共识性”比较高。

统计分析还发现,养育子女数量对流动信念和流动预期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流动体验具有显著影响(F值为2.36,p值小于0.05)。其中,无子女的流动体验最低(均值为0.16,标准差为0.12),

有三个或以上子女的流动体验最高(均值为0.95,标准差为0.28);有一个子女(均差为0.18,p值小于0.05)、有两个子女(均差为0.22,p值小于0.01)及有三个或以上子女(均差为0.30,p值小于0.01)的流动体验均显著高于无子女的流动体验。这表明,青年对自身的阶层流动体验与其生育意愿、生育行为显著相关。

(二) 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

1. 青年获得感的基本状况

统计分析发现,获得感总均分(均值为5.32,标准差为0.75)及五个维度得分均高于中值;获得内容均值为4.91(标准差为1.17),获得环境均值为5.38(标准差为0.91),获得体验均值为5.19(标准差为1.01),获得途径均值为5.49(标准差为0.89),获得共享均值为5.49(标准差为0.90)。

配对样本t检验显著性检验表明,获得感五个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获得环境得分显著高于获得内容得分(t值为29.65,p值小于0.001);获得途径得分显著高于获得环境得分(t值为-11.89,p值小于0.001)和获得体验得分(t值为-26.57,p值小于0.001);获得共享得分显著高于获得体验得分(t值为-26.02,p值小于0.001)。

可以看出,尽管面临一些压力和挑战,但青年获得感整体上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体现良好生活条件的获得内容得分相对较低;强调自主性和奋斗拼搏的获得途径,强调积极参与、感恩付出的获得共享得分均接近5.50分。这反映出青年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通过努力奋斗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积极体验。

2. 青年获得感的差异性分析

结果显示,性别(F值为0.00,p值大于0.05)、婚姻状况(F值为1.29,p值为大于0.05)、子女养育情况(F值为1.43,p值大于0.05)、户口(F值为0.61,p值大于0.05)、年龄(F值为2.54,p值大于0.05)、受教育程度(F值为0.61,p值大于0.05)在获得感均分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个人月收入在获得感均分上的主效应显著(F值为2.56,p值小于0.05)。其中,个人月收入1万元—1.5万元的青年获得感最高,1000元以下的青年获得感最低;个人月收入5001元—7000元(均差为0.30,p值小于0.01)、7001元—1万元(均差为0.26,p值小于0.05)和1万元—1.5万元(均差为0.39,p值小于0.01)的青年获得感均显著高于1000元以下的青年;个人月收入5001元—7000元的青年获得感高于3001元—5000元(均差为0.24,p值小于0.05);个人月收入1万元—1.5万元的青年获得感显著高于3001元—5000元的青年(均差为0.33,p值小于0.01)。

鉴于子女养育情况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对子女养育情况对获得感五个维度的影响进行方差分析(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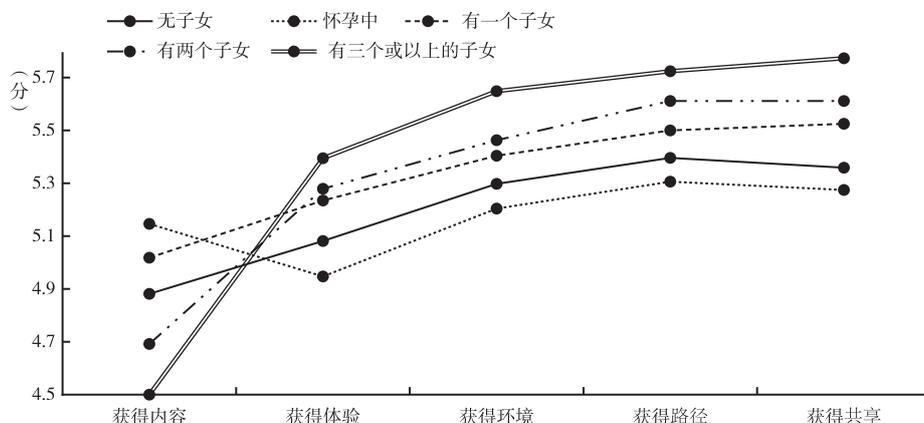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子女养育情况在获得感五个维度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子女养育情况在获得内容(F值为21.10,p值小于0.001)、获得体验(F值为12.55,p值小于0.001)、获得环境(F值为11.00,p值小于0.001)、获得途径(F值为14.19,p值小于0.001)和获得共享(F值为22.68,p值小于0.001)上的主效应显著。

事后检验表明,怀孕中和有一个子女在获得内容维度上最高,均显著高于无子女、有两个子女和有三个或以上子女。在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途径和获得共享四个维度上均表现出这些特征:有子女的高于无子女的,有三个或以上子女的显著高于有一个子女的和有两个子女的。

可以看出,受生育和养育子女带来的生活压力的影响,生育两三个子女的青年在获得内容维度上的得分较低;但在获得感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比其他人高。养育压力成为制约多子女青年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三) 青年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

1. 相关分析

对流动信念、流动体验、流动预期及五个维度获得感进行相关分析(见表1)。

表1 社会流动感知与获得感相关分析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流动信念	4.848	0.967								
2. 流动体验	0.753	1.667	0.084**							
3. 流动预期	1.739	1.667	0.094**	-0.107**						
4. 获得内容	4.908	1.171	0.203**	0.074**	-0.074**					
5. 获得环境	5.384	0.914	0.381**	0.096**	0.078**	0.275**				
6. 获得体验	5.192	1.011	0.360**	0.098**	0.023	0.400**	0.686**			
7. 获得路径	5.492	0.886	0.379**	0.094**	0.120**	0.202**	0.685**	0.564**		
8. 获得共享	5.490	0.897	0.391**	0.077**	0.126**	0.193**	0.677**	0.554**	0.701**	

注:** $p < 0.01$ 。

从表1中可以看出,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07,p值小于0.01),流动预期与获得内容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p值小于0.01),其余变量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2. 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经共线性分析,容忍度大于0.10,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特征值大于0,条件指数小于30,说明不存在共线性。

对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作用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首先,将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情况等人口特征变量以及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等客观社会阶层变量纳入模型1;其次,将流动信念纳入模型2;最后,将流动预期和流动体验纳入模型3(见表2)。

表2 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获得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回归系数	T	回归系数	T	回归系数	T
性别	-0.006	-0.433	-0.024	-2.019*	-0.001	-0.056
年龄	-0.050	-3.205**	-0.047	-3.362**	-0.052	-3.376**
户口	-0.023	-1.804	-0.021	-1.845	-0.029	-2.317*
婚姻状况	0.061	4.374***	0.028	2.245*	0.058	4.145***

续表 2

	获得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回归系数	T	回归系数	T	回归系数	T
子女养育情况	0.113	7.118***	0.081	5.699***	0.091	5.727***
受教育程度	0.018	1.412	0.015	1.286	0.024	1.859
个人月收入	0.099	7.473***	0.093	7.810***	0.109	8.204***
流动信念			0.438	38.725***		
流动体验					0.114	9.011***
流动预期					0.091	7.205***
R ²	0.024		0.213		0.042	
F 值	22.177***		211.512***		30.761***	

注：** $p < 0.01$ ；*** $p < 0.001$ ；T 值是对偏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模型 1 解释获得感 2.40% 的变异,且模型显著(F 值为 22.177, p 值小于 0.001);年龄对获得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 -0.050, p 值小于 0.01);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 0.061, p 值小于 0.001)、子女养育情况(回归系数为 0.113, p 值小于 0.001)、个人月收入(回归系数为 0.099, p 值小于 0.001)对获得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模型 2 加入流动信念。与模型 1 相比增加 18.90% 的解释力度,且模型显著(F 值为 211.512, p 值小于 0.001)。在模型 2 中,流动信念对获得感影响显著;流动信念越强,获得感越强(回归系数为 0.438, p 值小于 0.001)。由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模型 3 加流动预期和流动体验,累计解释获得感 4.2% 的变异,且模型显著(F 值为 30.761, p 值小于 0.001)。在模型 3 中,流动体验(回归系数为 0.114, p 值小于 0.001)、流动预期(回归系数为 0.091, p 值小于 0.001)对获得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流动体验与流动预期越强,获得感越强。由此,假设 2 和假设 3 均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20 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相关数据,本研究探讨新发展阶段青年社会流动感知和获得感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方面社会流动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自身阶层流动状况的感知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对子女的阶层流动预期显著高于对自身的流动体验;获得感及其五个维度均显著高于中值;控制客观社会阶层等方面因素后,青年对社会整体的流动信念仍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对自身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也正向预测获得感。

基于对社会整体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的主观感受产生不同层面的社会流动感知;不同层面社会流动感知均可以正向预测获得感,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与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相比,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对获得感的影响更强。获得感反映了民众享有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以及对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客观环境联系更为紧密,是在社会大众中非均衡分布的社会心理或情绪(周盛,2018)。青年对社会整体环境中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判断,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更强;而基于青年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和对子女的流动预期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均比较弱。

从社会流动感知的心理机制看,基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流动信念与不平等感知、制度合理化意识、世道正义观等更具“社会性特点”的心理因素联系更为紧密(Day & Fiske, 2017; Sagioglou et al.,

2018;张跃等,2019);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流动体验以及对子女的流动预期与贫富归因、控制感等具有更具“个体特点”的心理因素联系更为紧密(Kraus & Tan, 2015;王甫勤,2011;张跃等,201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层面,向上阶层流动不一定改善身体健康状况(Simandan,2018)和幸福感知(Iveson & Deary,2017)。本研究发现,青年的流动预期显著高于流动体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态度更为积极。同时,流动体验对获得感的影响略高于流动预期,感知的向上流动比预期的向上流动对青年群体当下获得感的心理体验影响程度更大。本研究还证实青年的阶层流动跨度较短,这种阶层内部短距离的流动体现了“阶层固化”的风险和趋势(吴炜,2016)。社会资本和资源逐渐向优势群体聚集,社会纵向流动通道狭窄,这使得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越来越狭窄;“精英二代”的代际流动继承增强(邓志强,2013)。

在获得感的五个主要维度上,青年在其中三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分别是:能够努力拼搏、想方设法发挥自己才能、积极把握机会的获得途径,社会保障制度带给自己生活美满踏实的获得环境,感恩并回馈社会的获得共享。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子女养育情况同社会流动感知、获得感的复杂关系。有子女青年的流动体验明显高于无子女的青年。除获得内容外,多子女青年的获得感均依次高于有独生子女或无子女青年。既有研究表明,生育率低是中国社会亟须解决的难题。除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外,生育意愿的转变对生育率的提高至关重要;与获得感较为相近的幸福感知具有正向“生育效应”,个体幸福感的提升能够促进生育意愿的提高(向栩等,2019)。在个性化生育鼓励与特定保障政策的支持下,形成生育与获得感提升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化解人口结构危机、促进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发展。

如何良性引导青年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观感受、提高获得感是本研究探讨二者关系的现实意义。建议有关部门更为关注青年社会流动感知的现状和群体差异,避免悲观和负面的社会流动感知;探讨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因素、理顺社会流动渠道,让广大青年切身感受更多社会公平和公正,青年的合理社会流动感知能够很快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 陈丽君、胡晓慧、顾昕,2022,《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作用》,《公共行政评论》第1期。
- 陈晓东、张卫东,2018,《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感知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第5期。
- 陈晓蓉、张昆贤、张汝立、黄培宏,2022,《流动感知对青年社会态度的影响——生活质量的双中介效应》,《西北人口》第2期。
- 陈云松、范晓光,2016,《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2019,《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社会学评论》第6期。
- 邓志强,2013,《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王俊秀,2019,《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心理学探新》第5期。
- 陆学艺,2006,《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吕小康、谭旭运、刘森林,2022,《以青春之奋斗创造青年之获得——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青年群体获得感的提升路径》,《光明日报》4月15日。
- 马继迁、朱玲钰,2021,《住房状况与青年获得感——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聂伟、蔡培鹏,2021,《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盛智明,2013,《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第4期。
- 谭旭运、董洪杰、张跃、王俊秀,2020,《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谭旭运、豆雪姣、董洪杰,2020,《社会阶层视角下民众获得感现状与提升对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谭旭运、张若玉、董洪杰、王俊秀,2018,《青年人获得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王甫勤,2011,《“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 王俊秀,2018,《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 文宏、刘志鹏,2018,《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第3期。
- 吴炜,2016,《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感知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向栩、田盈、田晨笑,2019,《幸福的生育效应——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西北人口》第6期。
- 张跃、郭永玉、丁毅、李凯,2019,《阶层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及其心机制》,《心理科学》第5期。
- 郑畅、孙浩,2016,《收入、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采用CGSS(2010、2013)数据的实证检验》,《西部论坛》第5期。
- 周盛,2018,《大数据时代改革获得感的解析与显性化策略》,《浙江学刊》第5期。
- Adler, N. E. et al.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 Daenekindt, S. 2017,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Mobility: Social Isolation, 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Disorient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3(1).
- Day, M. V. & S. T. Fiske 2017, “Movin’ on Up? How Perce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Affect Our Willingness to Defend the Syste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3).
- Houle, J. N. 2011,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Class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3).
- Huang, S. L. et al. 2017, “The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 Iveson, M. H. & L. J. Deary 2017,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88.
- Jin, Lei & T. Tam 2015,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Tempor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Health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43 (20).
- Kraus. M. W. & D. Keltner 2013, “Social Class Rank, Essentialism, and Punitive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2).
- Kraus, M. W. & J. X. Tan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 Manstead, A. S. R. 2018,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H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mpacts Thought, Feeling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2).
- Posel, D. R. & D. M. Casale 2011, “Relative Stand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outh Africa: The Role of Perceptions, Expectations and Income Mobili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4 (2).
- Sagioglou, C., M. Forstmann & T. Greitemeyer 2018, “Belief in Social Mobility Mitigates Hostility Resulting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Stand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4).
- Schneider, S. M.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Life Satisfaction: What Role do Social Cognitions Pla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6(3).
- Shariff, A. F., D. Wiwad & L. B. Akin 2016, “Income Mobility Breeds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Cross-N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3).
- Simandan, D. 2018, “Rethinking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March).
- Taylor, D. M. & F. M. Moghaddam 1994, *Theori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2nd edition).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Yang, C. & S. Zhao 2019, “Determining Preference for Potential: The Role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7(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旭运)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吕邈,通信作者)
责任编辑:王 兵

How Work Hours Impact Young People's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 *Liu Fei, Yuan Jiali & Zhang Wenhong*(28)

Abstract: For Chinese young people, the volunteering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young people are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career development, their work condition is the important socio-economic factor to influence their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regarding the specific acting mechanism, there exists a controversy between “time constraint theor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data from “Chinese Social Survey” in 2019,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or Chinese young people, the work hours would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of inverted “U” curve wi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rate and participation depth; for the young people with more flexible work hours,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and tend to contribute more service hours. These conclusions coul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Chinese context, and could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everal realistic issues,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transient and unstable nature of young people's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etc.

Keywords: Young People's Volunteering Time Constraint Theory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The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ense of Gain

..... *Tan Xuyun & Lyu Miao*(4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in 2020,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ense of gain, and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sense of gai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young people's mobility belief towards the social whole i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the mobility experiences towards themselves are also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and their mobility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own mobility experiences; the young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concrete dimensio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ddle valu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factors like objective social class, etc. , the young people's mobility belief toward social whole sti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s sense of gain, their mobility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ir own situation and mobility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 also positively predict sense of gain; compared with mobility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mobility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 the mobility belief based on social whole environment could stronger predict sense of gain.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understand social mobility rationally and improve sense of gain.

Keywords: Young People Perce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Sense of G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Minors

..... *Feng Chengcai*(50)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large rural population outflow,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minors appears “omiss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relevant issu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minor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rural minors'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is weak, the family's protection capability is not strong; from the meso level, the schools' responsibility scope towards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is limite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tection force is insufficient, the network protection's entry point is lacking;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active protec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tection mechanism needs to be optimized. It is recommended